

#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編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號

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

\*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8 字數 27,000

一九五七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南京第六次印刷

印數 235,001—265,000

統一書號： 3100·116

定 價：(4) 八 分

(內 部 發 行)

## 目 录

|                   |    |
|-------------------|----|
| 党不能发号施令嗎？         | 2  |
|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 6  |
| 反右派斗争的一次偉大胜利      | 18 |
|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 20 |
|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        | 28 |
| 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黨員的重大考驗 | 33 |

## 目 录

|                         |    |
|-------------------------|----|
| 党不能发号施令嗎？ .....         | 2  |
|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    | 6  |
| 反右派斗争的一次偉大胜利 .....      | 18 |
|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        | 20 |
|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 .....        | 28 |
| 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驗 ..... | 33 |

## 党不能发号施令嗎？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論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一般地并不直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共产党的领导。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时候，他們又說，他們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只是反对所謂“党天下”的思想，只是反对共产党組織在各个国家机构中起领导作用，以及反对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我們在这里想專門談談所謂党对人民发号施令的問題，其他的問題將另行討論。

黃紹竑在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談到党政关系問題的时候，曾經批評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或者党和政府联合发布指示，認為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龙云、譚惕吾、楊玉清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也有类似的說法

真的是如此嗎？党的发号施令居然有这样大的罪惡嗎？

不要誤会了黃紹竑。他也是十分“拥护”党的领导的。据本报5月17日的記載，他在提出上述意見的时候先說了这样一番話：“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也必須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疑問馬上就来了：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共产党领导革命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固然离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共产党为了领导历次群众运动，贯彻执行各项政策和重大的法令，仍然免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或者同政府联名发号施令。据说这个领导方法“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然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却在这个领导方法下得到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得到了巨大的进展。这怎么能够“毫无疑问”呢？

究竟所谓党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强制性的命令，那么，这不是党的任务。党是群众的思想政治的领导核心，而不是有必要对群众实行某种强制的国家机关。党不但在自己的群众工作中经常防止和坚决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求自己所领导的政府机关也防止和反对命令主义。这就是说，政府虽然常常需要向人民发布强制性的命令，但是也不应该以为仅仅依靠命令，而不依靠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就可以完成任务。

第二，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关于日常行政事务的指示，那么，这也不是党的任务。党是我国政府的领导力量，它领导制定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并且力求保证它们的正确实施，但是它不能代替也不应该代替政府机关的行政活动。党反对包办代替任何非党机构的活动，反对离开自己的政治任务而陷入日常琐事的事务主义倾向。

第三，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向人民发布政治任务的号召，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的指示，那么，无论是由党单独发布，或者是由党同政府联名发布，都是必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共产党是劳动人民中最觉悟的部分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由于它的主张的正确，由于它在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线，在全国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解放区，

广大的人民群众固然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先进的群众也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正是由于党对于人民群众坚持正确的领导，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发布各种号召和指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行动，这才使人民革命得到了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发生的变化，就是党的领导地位更巩固了，党的领导作用已经普及和深入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同全国六亿人口结成了广泛的血肉的联系。而这也就是我们的国家可以实现空前未有的团结和统一，我们的国家的各方面工作可以获得空前未有的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全国的各方面的行政工作，当然需要由政府机关去执行。但是不但在中央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需要由党来领导制定（在领导制定的过程中，党首先依靠对于广大群众的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而且在地方和基层，这些方针政策仍然需要由党来保证它们的正确的、适合具体情况的贯彻执行，仍然需要由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思想工作，使这些方针政策变成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周总理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共产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不但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是任何其他党派和其他政治组织所不能代替的。试问，有什么理由来改变和削弱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呢？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民直接听到党的声音呢？难道把党的声音对人民秘密起来，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就可以大大加强，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吗？

真是出奇的好主意！这种好主意的实质是什么？

这种好主意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机关变为真正的

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不对人民“发号施令”（在我们所已经解释过的意义上）的执政党是有的。那样的党是因为彻底地脱离人民，所以它不可能向人民发出任何有威信的和指示。那样的党所“领导”的政府，除了向人民实行强制以外，不知道别的也不能有别的工作方法。大家记得，国民党就是那样的党，国民党政府就是那样的政府。

的确，黄绍竑之流对于那样的党、那样的政府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曾经在那样的党和政府里久居高位，他们通过那样的党和政府的机构干了些什么事，人们记忆犹新。因此，对于他们的“批评”，人们也不难作出正确的估价。

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因此，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个制度还有许多不了解，对于党在这个制度中的作用还有许多不了解。同时，也由于这个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党和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也还有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提出的一切善意的批评，应该加以欢迎；一切正确的建议，应该加以接受；提出的疑问，也应该进行解释。但是为了捍卫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党的领导地位，对于恶意的挑拨者和诽谤者，人民的任务却是给以坚决的、毫不含糊的回击！



##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基本分歧

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陸定一

我完全同意周恩來總理、李先念、薄一波副總理、董必武院長、張鼎丞檢察長、彭真副委員長、烏蘭夫副總理和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報告。

### 我國歷史上偉大轉變的一年

過去的一年，在我國歷史上是偉大轉變的一年。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在我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個革命是用和平的方法實現的。我國經過了這樣一個深刻的革命，却在經濟上 and 社會秩序方面沒有發生波動，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功。原來預期要十幾年才能完成的社會主義革命，七年就基本完成了。這對於人民政權的鞏固，對於我國經濟和文化建設的今後發展，都是極其有利的。

過去的一年，我國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有了空前的發展。就工農業生產的總產值來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實際上已經四年完成。這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的大勝利。

過去的一年，我國戰勝了數十年來未有的大災荒。這種大災荒，在舊社會里會引起大量的死亡，會使災區農業生產多年不能恢復正常狀態。我們卻避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

以上這些，我們都做到了，但是我們還不滿足。我們清醒地看到，雖然有了這樣大的成績，但是工作中還有錯誤和缺點，還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必須消除這些錯誤和缺點，以便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動員國內國外一切積極因素，使社會主義建設得到更為順利的進展。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从去年起已经陆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把这些政策作了系统的说明。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透彻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今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整风运动。

以上所说的经过情形，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要再说一遍，因为有些右派分子在胡说八道。他们说，共产党到处是错误，天下是漆黑一团。他们说，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非整风不可，而且非下台不可。

共产党的此次整风运动，是在取得了大胜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他的报告里提出的各项政策，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政策在内，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条件之下提出来的。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取得胜利，就不可能系统地明确地提出这些政策。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取得革命胜利的斗争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般地是接受或赞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再加上其他因素，所以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政策。同时，今年又决定在党内进行整风运动。

### 右派分子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可以看到，人们对整风运动和对党的政策，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绝大多数的人，是站在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了解整风运动和党的政策的。他们真心善意地帮助共产党，要加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只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以为鸿鹄将至，天要变了，可以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制度、向共产党大举进攻了。

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资产阶级右派混在真心善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群之中，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进行他们蓄谋已久的政治活动。他们积极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们企图首先夺取民主党派、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司法界的领导权，然后进一步夺取全国的领导权。他们企图鼓动学生闹风潮，并且作出估计，说学生问题一触即发。他们以为，学生一上街，右派分子一到基层去点火，工人职员就会跟着学生闹事，右派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和六教授谈话时做出的估计。值得注意的是，这六教授中，有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掄在内，他就是向章伯钧献计，说什么学生问题一触即发的。一个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唯恐学校不乱，究竟居心何在？我们不能不问。

现在，事情已经明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工农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知识分子的觉悟程度，过低地估计了工商界的觉悟程度，也过低地估计了各民主党派中多数干部和成员的觉悟程度。右派首先在工人那里碰了壁，工人把到工厂里去活动的右派分子赶了出来。右派在农民和城市居民那里也碰了壁，他们反对右派的反动行为。右派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但他们在高等学校里充其量只得到大约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支持和盲从，随后盲从的人也纷纷觉悟过来，现在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个人了。右派把希望寄托在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提出了什么“保护科学家”，什么“教授治校”之类的蛊惑性的口号，施用了吹、拍、骗的手段，但是他们仅仅能够得到百分之几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盲从，现在，这些人的大部分也正在离开他们。右派在工商界中仅仅得到寥寥落落的几声响应，却出乎他们意料地遭到大多数工商界人士的反对。右派在民主党派中也是很不如意的，现在许多民主党派决定要整风，并且已经起来反对右派分子。这个时期，全国人民上了一堂政治课，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而右派则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 要不要社会主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起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许右派翻案，不许右派倒算。

右派煽惑说：肃反运动“糟糕透顶”，思想改造运动完全错了。

现在看得很明白，幸亏我们做了肃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否则，这次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恐吓信和炸弹案是会多得多的，社会秩序是会乱一些的。文艺界如果没有进行过反对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斗争，这次就会更乱一些。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所以只有很少人附和右派，不能不说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肃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周总理所说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组成部分。我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可以有三种道路。一条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一条是，以强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条是，反革命依靠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力量，实现复辟。这三条道路之中，那一条道路对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最为有利呢？当然是和平革命最为有利。我们在宪法总纲中，已经把和平革命这条道路确定下来。为要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不进行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可以不可以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不进行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就不能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等待反革命来进行复辟。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对已经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一个倒算，来一个翻案。我们全国人民同右派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我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應該起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許右派翻案，不許右派倒算。

## 要不要工人階級領導？

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成功，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国的革命。反共，这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第二个根本分歧，是对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看法問題，是对工人階級政党和資產階級政党的看法問題，也就是中国革命應該由那个階級來領導的問題。

右派認為，資產階級比起工人階級來，資本家比起工人來，決不是更差一些，而且还似乎是更好一些。斯大林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意思是勉勵共產黨員，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有什麼不好呢？右派分子章乃器反對斯大林的這個說法。章乃器的意思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並不比資本主義思想高明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的思想並不比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思想高明些。既然如此，那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就是錯誤的。憲法第一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右派說：工人階級領導就是“溝”和“牆”的來源。因此，工人階級的政党共產黨不應當領導國家，如果領導國家，那就是“黨天下”。因此，就應當反對“黨天下”，實行“輪流執政”，實行“兩黨制”，搞“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等等。

憲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過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等都是人大代表，都投過票贊成憲法。可是他們背信棄義，要來反對憲法第一條。這難道不是根本分歧么？

我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憲法里確定，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

級領導的國家，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根據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革命經驗規定下來的。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我國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或者是新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中間的道路——資本主義的中國，是不可能的。中國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成功，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的革命。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尚且不能實現，何況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還能設想嗎？

翻開我國的歷史，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政變、義和團、辛亥革命，都遭到了失敗。直到十月革命後，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我國的先進人物才覺悟到，中國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勝利，因而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中國革命展開了嶄新的一頁。聯共與反共成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所有的反動派沒有不反共的，所有的革命派沒有不聯共的。孫中山先生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革命事業就興旺起來。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反共剿共，革命事業就倏斷送，日本帝國主義就致子來并吞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我國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就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抗戰以後，蔣介石再次進行反共的內戰，我國幾乎變成美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幸而人民的力量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已經壯大，所以我們能夠推翻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統治，把我國從危急存亡的險境里挽救出來。中國人民在三翻四復的經驗中，已經懂得：反共，這就是賣國，就是亡國，就是民族的大災難。中國人民把自己的長期的經驗總結為一句話，叫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並且把工人階級的領導寫到憲法里而去。右派的所謂反對“黨天下”，不是別的，就是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等反革命論調的翻版。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等，在開始叛變民主革命的時候，都說他們自己是革命的，決不會做反革命，他們僅僅反對共產黨而已。資產階級右派說，他們自己是擁護社會主義的，

是好心好意的，他們仅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已。兩者之間，手法完全相同。

## 要不要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国家必須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專政；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民主集中。右派的所謂“绝对民主”，无非是想迷惑群众，造成天下大乱，进行反革命复辟。

我們同右派的根本分歧，也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看法的問題上表现出来。

究竟是无产阶级民主制更加民主些？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制更加民主些呢？我們認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狭窄的，殘缺的，虛伪的，假仁假义的，对于富人是天堂、对于穷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是騙局的民主制”；无产阶级民主制，是“为絕大多数民众，为被剝削的劳动者所享受，并发展到空前未有的地步的民主制。”（以上引語都見列宁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書）右派与此相反，他們要求什么“绝对民主”，他們說，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这种“绝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制比无产阶级民主制还要民主。

我国资产阶级只有几百万人，资产阶级民主充其量只是几百万人的民主。劳动人民有几万万人，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几万万人的民主。只看看这一点，就知道无产阶级民主制比起资产阶级民主制来，要更为民主得几百倍。历史上，我国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几次国会选举，包括蔣介石的国民大会的选举在內，都是賄賂公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在我国老早已經破产，实在沒有有什么可以羨慕的地方。現在，我国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下，不仅劳动者有公民权，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享有公民权。世界上沒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有象我們这样的广泛的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制，是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最民主的一种。它只

对极少数的人实行專政。资产阶级民主制，却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專政。比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还要民主的制度，那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有，因为那时就不需要專政了。可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專政的对象沒有了，政权也就不存在了。那时候还有民主問題，但已經不是“民主与專政”这个范畴里的民主，而只有“民主与集中”这个范畴里的民主了。主張“绝对民主”的先生們，你們的所謂“绝对民主”，是意味着不要專政么？一切政权都是阶级对阶级的專政，社会主义国家必須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專政，否則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存在。你們的意思是不要集中么？人类社会永远需要集中。沒有集中，就犹如沒有民主一样，人类社会的存在不能設想。所謂“绝对民主”，只是反动的幻想，現在不会有，將來永远也不会有。

依照右派的主張行事，既不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專政，又不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我們的国家就毫无疑问一定灭亡。

右派的目的，是用所謂“绝对民主”的口号，来迷惑群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局势，以便反动分子可以乘机大肆活动，进行反革命的复辟，建立反革命的專政。

## 要不要联合苏联？

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我們同右派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

宪法序言說：“我国同偉大的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經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將繼續发展和巩固”。

应该发展和巩固中苏友谊呢？还是应该削弱和破坏中苏友谊



呢？宪法明明写着“繼續发展和巩固。”

联合苏联，这不但是共产党的主張，孙中山先生也老早提出了这样的主張。孙先生的致苏联遺書，現在我們讀起来还非常感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沒有中苏兩国的巩固团结，世界和平就沒有可靠的保証，人类就可能受到极大的灾难。所以我們主張无微不至地爱护这个团结。

右派同我們不一样，他們用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来煽动群众，要挑起中苏之間的不和。他們的言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蔣介石的論調的翻版，就是要把苏联說成是“赤色帝国主义”，而不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

資产階級民族主义有三种。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是革命的，我們贊助这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有中立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中立主义，在資本主义世界里出現，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是我們所同情的；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出現，就有不同的作用，是我們所不同情的。有反苏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些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我們必須坚决反对。右派的反苏活动，在我国是違反宪法的，是不容許的。

## 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綜合以上所說，可以看見，我們同右派的斗争，是兩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階級领导，不要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張，就是要我們亡国，就是要我們人头落地。

我們同資产階級右派在这些根本問題上进行斗争，已經有多

年的历史。一九五三年，就有人发表所謂“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的謬論，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从此以后，我們同右派年年有斗争，事事有斗争，不过规模不象今天这样大罢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經過了几十年的長期反复的斗争。人民对于誰是敌人，敌人的斗争方法是怎样的，我們要达到什么目的，和如何达到目的，知道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革命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为深刻的革命，它影响到六万万每个人人的生活。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現在只有八年，从一九五三年宣布总路綫算起，只有四年。時間很短，社会主义革命却在鑼鼓和欢呼的声音中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人人要过的，但是我們只在經濟上过了关，在思想和政治上許多人尚未过关。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中，有許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很热心的，愿意为之坚决奋斗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愿意接受，却并不那样热心了，并不那样愿意为之坚决奋斗了。这就使得右派觉得他們的思想还有市場，于是他們敢于翹起尾巴，猖狂进攻。

### 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远远沒有完成

我国已經是社会主义国家，剝削阶级已經基本消灭，大規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时期已經过去。但这决不是說，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沒有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很長的过渡时期中，剝削阶级的残余及其影响只能逐步消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会繼續着，甚至还出現过象匈牙利事件那样严重的斗争，至于国际范围内同帝国主义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說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完成但还没有完全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經巩固但还没有完全巩固。我国国内还有台湾沒有解放，还有为数不多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国外还有以美国帝

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時時刻刻企圖顛覆我國的人民政權。在人民內部，有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為階級鬥爭，至於工人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更會長期存在。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願意接受社會主義，但是少數右派分子卻反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決不甘心放棄剝削，他們夢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要為此作最後的掙扎。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輕視的，他們有財產，有知識，有一定的管理和組織的能力，同國內外反動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有進行政治鬥爭甚至武裝鬥爭的經驗。所以，我國還會有長期的階級鬥爭，而且這個鬥爭有時會採取很尖銳的形式，這是肯定了。如果以為剝削階級既然已經基本消滅，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鬥爭的時期已經結束，因而我國就沒有階級鬥爭了，那就錯了。

此次右派的猖狂進攻，告訴我們：思想改造工作，過去雖然有粗糙的地方，但是整個說來，不是做多了，而是還做得不夠，還做得不很好。許多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要在思想上政治上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還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們只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人們的思想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還遠遠地沒有完成，我們還必須繼續努力在一切方面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們培養了一批政治教師，這是一個成績。政治教師的絕大部分，在這次右派的猖狂進攻中，能夠站穩立場，這是可喜的。政治教育過去有脫離實際的缺點，經過了這次實際鬥爭，這種缺點就有改正的希望了。社會主義的教育同資本主義的教育不同，社會主義的教育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為自己的靈魂，離開了它，就不是社會主義的教育了。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學生的實際思想情況結合起來。這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工作，又是一件難做的工作。各級教育部門和學校教師要同政治教師在一起，把思想教育政治教

育做好。輕視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教師，是完全錯誤的。

### 整風也是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也是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任何資產階級政黨決不願意號召別人來揭露自己的錯誤。這件事只有工人階級的政黨才敢做。只有工人階級政黨，才能反對和清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

整風運動開始以來，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對人民政府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這些意見受到共產黨、人民政府的歡迎。這些意見中有一部分帶有片面性和偏激情緒，但仍然是有益的意見，是同右派的謬論根本不同的。我們必須仔細分別香花與毒草。我們的政策，依然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放手發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改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我們所要長期堅持下去的工作方針。我們應當看到，我們正在做着前人沒有做過的偉大事業，雖然成績很大，但錯誤和缺點必不可免。我們一吋一刻也不要驕傲，我們應當揭露和改正工作中的一切錯誤和缺點，使我們的祖國更快地繁榮起來，富強起來。我們的無數先烈，為了這個目的，不惜粉身碎骨。想起他們，我們就感動得流淚。我們有什麼理由，隱瞞自己的缺點錯誤，不肯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呢？右派必須無情批判，整風運動必須堅決繼續進行。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 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開幕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論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已經胜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大会經過了充分的討論之后，通过了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預算和关于1957年度国民經济計划的決議，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決議，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报告的決議，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問題的決議，关于成立广西僑族自治区的決議，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決議，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或者核准的決議，关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長关于中緬边界問題的报告的決議。

这次大会开会期間，正是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一斗争实际上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繼續，它对于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全国人民的命运关系十分重大。因此，从大会的各项报告到小組討論和大会发言，一直充滿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代表們用自己亲身經歷的事实駁斥了右派分子散布的錯誤言論，証明中国必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領導。不論在大会发言中和小組討論中，代表們(除极少数右派分子以外)都表現了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憤慨，表現了对共产党的路綫、政策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的热烈拥护。代表們还揭露了許多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他們的义正詞严的責問，迫使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不能不低头認罪。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这次大会的进程，生动地証明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

的大團結是十分巩固的，不可動搖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向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猖狂進攻的時候完全沒有估計到這一點。利令智昏，他們對於人民內部的政治形勢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他們的賭博落空了。這次大會還證明了知識分子的改造和工商界的改造雖然遠沒有完成，但是已經取得很大的成績。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工商界的代表在這一鬥爭中是站在擁護社會主義方面的，而且經過這一次鬥爭的鍛煉，他們的認識更明确了。

在這次大會上，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們經過各方面的揭發和批判，對自己的錯誤作了檢討。其中，有些人的檢討表示有悔改的決心，雖然檢討的誠懇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的檢討，究竟是企圖用避重就輕的欺騙手法蒙混過關，還是也有若干交代悔改之意，需要他們今後用自己的行動來證明；也有些人的“檢討”，一望而知是還沒有交代悔改的誠意的。但是，只要他們不是恬惡不悛、自絕於人民，只要他們真正開始承認自己的錯誤，總是值得歡迎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會發生變化，右派分子們也在變化。由於人民向右派分子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右派分子現在孤立起來了，只要他們不願自絕於人民，那末，他們現在除了徹底認錯、重新作人以外，已再沒有別的出路。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分子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會主義改造的大門對他們是開着的。”只要他們回心向善，那麼，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對於他們還是適用的，他們還是有可能由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

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得很好，不僅會大大推進我們的各項工作的前進，而且大大推動了全國人民的反右派鬥爭。但是應該看到，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粉碎右派的活动，還是一個長時間的任務。我們應該在已經取得的勝利的基礎上，繼續採取揭露右派的反動活動事實和說理的方法，使鬥爭深入下去，使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得到彻底的勝利。

## 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社論

現在我們都公認毛主席這樣的論斷是正確的：在我們國家里，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反革命分子不多了，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事實，它從一個重要的方面表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國家已經基本上解決了摧毀反革命勢力的歷史任務，走上了鞏固發展的階段。

反革命分子之所以不多了，首要的原因正是過去幾年來的鎮反運動和肅反運動。這本來是很容易了解的事。然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特別是那些企圖用庇護反革命分子和成立所謂平反委員會來取得政治資本的英雄們，却竭力散布種種謬論，特別攻擊一九五五年開始的在機關學校進行的肅反運動，說它“糟糕透頂”，根本沒有成績可言。另外一些人，或者由於在肅反運動中被鬥爭過，或者由於把暫時的局部的現象當作全體，也隨聲加以附和。為了澄清這些錯誤意見，對於肅反運動（主要是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究竟有無成績，成績大小，必須根據事實，加以實事求是的討論。

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是一場艱苦的、複雜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敵人是隱蔽的。正因為這樣，我國人民在肅反鬥爭中，不但依靠專門的國家機關——公安部門——的工作，而且首先依靠廣大群眾的積極參加。我們認為，只有廣大群眾積極投入這個鬥爭，才能比較容易發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才能比較少犯錯誤。要錯誤少就得經驗多，而經驗是需要積累的。從這個觀點出發，才能正確地估計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的成績和錯誤。

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的成績，有以下四個主要的方面，

第一，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就現在已經定案的來說，有八

萬一千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寬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沒有計算在內)。在这些反革命分子里面,有美蔣特务机关派遣进来的特务間諜,有老早就潛伏下来的特务間諜,有重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集团。把他們清查出来,对于我国的国防和建設的安全,无疑有极大的意义。

第二,由于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內部日益趋向于分化和瓦解。一年多来,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其中包括不少長期潛伏的和美蔣派来的特务間諜分子。1956年全国的反革命案件,比1955年减少了40%以上,其他刑事案件也减少很多。对于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帮助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帮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順利进展。

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問題,例如隱瞞参加反动組織、隱瞞反动身份、隱瞞历史上的惡迹等等的問題。不弄清楚这些問題,就很难划清敌我界限,而他們自己也将背着沉重的包袱。現在,对他們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結論,使他們去掉了精神負担,便于积极工作。这無論对于人民事业或者对于他們本人,都是有利的。

第四,經過肃反运动,群众比較懂得了怎样去識別隱蔽的敌人。使广大群众具有对隱蔽的敌人的警惕性,具有識別暗藏反革命的能力,不仅过去和現在需要,將來也仍然需要,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蔣介石集团和殘余的反革命分子还存在。大家都看到6月9日报紙上的一条消息:6月7日晚上,一个特务分子在广州文化公园扔了定时炸彈。如果不是被兩位青年学徒发觉,就不知道会有多少游客死在特务手里。很明显,群众的这种革命警惕性,經過肃反运动是更加提高了。

以上所說的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績,都是不容抹煞的。

否認肃反运动有成績的有几种人。一种人同人民站在相反的



立場上，从根本上否定肃反运动。人民認為肃反很必要，他們却認為肃反本身就是錯誤。人民因为肃反的結果得到了安定的社会秩序而感謝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們則因为自己的階級本能，在思想感情上总觉得把反革命分子搞得太狠了，而对于肃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于領導肃反运动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心懷怨恨。这种人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例如黃紹竑，在解放以前本来是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劊子手。这样的人，对于肃反运动怎么会不竭力反对和加以污蔑呢。

另一种人承認肃反运动有成績，却認為成績太小了。他們說，“搞来搞去沒有搞出多少反革命分子”。在他們看来，八万人的數目是太小了，值不得“小題大作”。

这种意見是錯誤的。首先，就是不說肃反运动給予整个反革命活动的沉重打击，也不說由于肃反运动才投案自首的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單是八万个反革命分子也决不是什么小事。难道一定要八十万个，八百万个，才值得我們兴师动众去肃清么？

其次，應該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間，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門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經是內务部戶政司司長的周維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長而且負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又如山西师范学院教授、民主同盟成員潘恩溥，是一个叛徒和中統特务分子。他曾經破坏內蒙古东胜旗革命运动，出英党的負責人，致王若飞同志被捕，田得秀同志被害。又如吉林省委宣傳部理論教育处处长于民一，原来是1938年混入革命队伍的中統特务。又如，公安部十局副处长張荣桂，竟是一个混入共产党十八年的特务，早在1935年他就参加了国民党反革命組織G. G.。

讓反革命分子掌握了重要职务，窃据了要害部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敌人在我們的革命堡壘里面，埋下了按照敌人意志活动的“定时炸彈”。这些炸彈一旦爆炸，就可能給我們的国家和人民事业造成难以逆料的損失，

還應該指出：在 1955 年—1956 年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中，現行犯有三千八百餘名之多，而且這方面還有相當數目的重要的特務間諜。

廣州市第十五中學教員黃然，1955 年 3 月經澳門的特務分子張維安、張維柱介紹，參加了蔣幫特務組織，被委任為“廣州工作組組長”。他曾八次用密寫、暗語等方法同特務組織聯繫和寄送情報。武漢市勞動局調配處會計王鵬，是蔣幫保密局的上尉通訊員，解放前干過逮捕進步學生、監視中共代表團等罪惡勾當。1949 年，他在日本的“中美聯合工作總部萬能情報員訓練班”受訓，1950 年就潛回大陸進行特務活動，向敵人送過密寫情報多次，並陰謀架設電台。山西太原機車車輛修理廠四級工程師王學中，騙取了先進工作者稱號，審查結果竟是奉保密局太原站長田峻之命，攜帶電台一部，潛伏下來進行特務活動的軍統特務。

有人說，在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中間，大部分並非身居要職，也不是現行犯。但是第一，對於重要的和現行的反革命分子的危險性，不能簡單地拿數字去判斷；第二，沒有身居要職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對於人民的危險性也決不允許忽視。

許多人都知道抗日戰爭時期發生的河北灤縣“千人坑”大慘案，有一千二百八十名愛國同胞在這個慘案中遭到活埋。當時河北灤縣日偽警察所警務股書記張占鰲，就是這次慘案的兇手。在埋人坑前面，曾經有一位婦女攜着一個小孩，跪在他的面前求饒。毫無人性的張占鰲竟一木棒把這位婦女打到坑里，然後提起孩子的兩隻小腿扔了下去。解放以後，他改名換姓，混進了黑龍江省龍江縣的教育界，當了小學教員。

1947 年蔣軍侵入山東省昌邑縣的時候，該縣角蘭鄉自衛團長畢晉祥，同一幫匪徒活埋和慘殺了本鄉的十五名革命幹部、積極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其中五個人是畢晉祥直接動手殺害的。這個劊子手還慘殺了七改積極分子李永勝的全家，包括一個三歲的孩子。

直到这次肃反运动，才把他从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杂工中清查出来，象这样万恶的凶犯，能够听任他们逍遥法外吗？

这样的劊子手，隐瞒了自己的血腥的历史，甚至改了名，换了姓，混在人民内部，虽然暂时同反革命组织中断了联系，暂时隐蔽不劫，但是有什么根据相信他们已经痛改前非，真正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呢？一旦他们认为时机到来，他们就会重新擦亮屠刀来对付人民。6月25日报载，山东馆陶县浮渡乡乡长申林台全家九人，有七人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行凶的主犯申孟春在敌伪时期当过伪军班长，对革命群众有过血债。这一次他只是怀疑申林台知道他的底细，就对申林台全家下了毒手。对于这样的豺狼，难道不应该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重新动手以前，就把他们清查出来么？

彻底肃清反革命，这是我国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正因为这次肃反运动在历次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又得到了新的巨大的胜利，清除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弄清楚了许多人的政治问题，我们的革命队伍更加纯洁了，所以党和人民政府才有把握作出这样的论断：反革命还有，但已经不多了。

再还有一种人说，肃反成绩的确很大，但是错误缺点更大，因而得不偿失。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当然，我们说肃反运动有巨大的成绩，并不是说在肃反运动中沒有错误，沒有偏差。肃反运动确实有错误，在极少数单位，错误还很严重。无论错误大小，有了错误就必须纠正，不能含糊。但是这些错误同上述的肃反运动的重大成绩比较起来，只能说是次要的。

肃反运动中究竟有那些错误呢？

错误的性质有两类。一类是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漏掉了一些本来可以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另一类是不少单位错斗了一些好人。这些单位曾经根据一些不确实的材料，沒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把本来沒有政治问题的好人错认为坏人。还有一

些人平日工作上出过容易引起怀疑的差错，肃反运动一来，这些单位的领导方面没有冷静地加以分析，混淆了工作上的差错和反革命破坏，以致把这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了。

究竟为什么一些共产党员会犯这种现在看起来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呢？这是因为，反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本来是一件难事。加以许多单位没有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因而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把坏人当作了好人，或者把好人当作了坏人。漏掉了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继续清查，不能因为肃反有了成绩而懈怠疏忽。错斗了一些好人，伤了他们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使其中一些人暂时地同党和政府疏远了，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某些环节暂时地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对于这种错误必须坦白承认，并且彻底纠正。

有一些没有反革命活动、但是隐瞒了政治问题的人，在肃反运动中也曾被斗争过。因为隐瞒政治问题而引起怀疑，隐瞒者本人不能说没有责任。经过清查，现在才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如前所说，弄清了他们的政治问题是好事，但是把其中有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却是错了。

此外，在一个短的时间内，有些地方，在斗争方式上犯了错误，例如打人骂人等等。这些错误仅仅是发生在1955年肃反运动初期小组斗争的高潮当中，时间很短，一经发现，就采取了纠正的措施。

有些人不大喜欢“难免”论。当然，如果可以避免的错误而没有避免，那是不能用“难免”论来推卸责任的。但是象肃反这样的斗争，你或者根本不进行，那只能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来；或者認真地进行，那就确有一部分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尽可能地防止错误的发生和扩大，尽可能地避免不能补救的错误。这些措施确实避免了許多错误，但是仍然没有避免了也不可能避免所有的错误。

就错斗了好人的问题说，无论是直接被错斗的人，或者是同他

們亲近的人，或者是自己参加了錯誤的斗争，或覺抱歉的人，或者是完全旁觀、代打不平的人，对于这样的錯誤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公平的認識。錯誤都是不对的，不好的，不應該掩護和粉飾的；身受錯誤損害的人，尤其不免有种种痛苦。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这种錯誤是为什么发生的呢？是为了保存反动势力？是为了私人的恩怨利害？是明知其为錯誤而故意犯錯誤，不是的。犯錯誤的人（除了极个别的假公济私、明知故犯、因而必須懲处的例外）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們当时并不知道而且很难知道自己是犯了錯誤。在最英勇的統帥所指揮的完全正义的战争中，也无法保證被炮火攻击的都是該受攻击的。不但普通居民，有时甚至自己方面的战士，也会受到誤伤。但是我們能不能根据这些无心的过失，去否定一場革命战争或者卫国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呢？我們能不能因此而把犯了这些过失的將士看作冤仇呢？同样，每一个能够客觀地权衡利弊得失、分清大是非和小是非的人，对于肃反斗争中的錯誤，以及其他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的錯誤，也不难作出正确的而不是片面的、感情用事的判断。

毫无疑问，在斗争中，同一些人伤了感情，发生了一些副作用（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是难于弥补的副作用），对于这一点應該有足够的估計。我們認為，在一方面，暂时受伤害的人應該看到事情的本質和整体，不要怨恨不已，必报复而后甘心；在另一方面，在斗争中誤伤了好人的人，特别是各單位肃反斗争的領導人，必須向一切受了伤害的好人公开承認錯誤，进行賠礼道歉。当着原来参加斗争的群众恢复他們的名譽。这个工作許多地方已經进行过，已經取得了許多被錯斗的人的諒解。有些地方善后工作做得不好，應該立即毫不躊躇地認真补课。即令有些人暂时还不諒解，我們相信，当他們彻底了解了肃反斗争的意义，看到了肃反斗争的某些錯誤确是难以完全避免，那些犯錯誤的人对他們确是毫无私怨，而且在認識了錯誤以后坚决糾正錯誤，向他們誠懇地賠礼道

歉，当众恢复他們的名譽之后，他們終有一天是会完全諒解的。

說肅反的成績是主要的，是指就全国、全省、全市、全区来說的。至于某些單位，錯斗了一些人，而并没有搞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或者根本那里就沒有反革命分子，当然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結論。即使在这样的單位，也不能抹煞肅反的成績。把一个單位的全体人員的政治面目弄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是成績呢？至于用这样的局部的情況去判断全体，那自然更不正确了。

無論如何，凡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場上的人，凡是坚决主張肅清反革命的人，决不能給肅反运动潑冷水，决不能給参加肅反运动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潑冷水。人民事业的进步；人民民主專政的巩固，依靠而且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的任劳任怨、百折不撓的奋斗，依靠而且只能依靠他們在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地增加經驗，提高觉悟。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对他們潑冷水，实际上也就是对革命潑冷水，对社会主义潑冷水。

反革命分子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有，因此还需要繼續警惕，繼續識別，繼續清除。“有反必肅，有錯必糾”，这就是革命的人民的方針。为了貫徹执行这个方針，对于过去的肅反运动的成績和錯誤，作出透彻的分析和恰当的估計，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用事实来駁倒那些根本反对肅反运动的右派分子，才能够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肅反运动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才有利于認真糾正工作中的左的和右的錯誤，也才有利于保护人民群眾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积极性。

##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社論

从整風运动开始以来，許多人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对于某些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的人事工作，提出了不少的建議和批評。这些建議和批評有兩種情况。一种情况，意見是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意見指出了某些部門在干部的考察、任用和待遇上，在干部管理的方法方式和人事工作干部的人选上，在对待非党干部的宗派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上，确实有严重的缺点和急待解决的問題。对于这种意見应当認真地傾听、研究和采納。这种意見將积极促进人事工作的改善。另一种情况，意見是錯誤的。这种意見否定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的原則和人事工作的成績。按照这种意見，似乎事情都搞糟了，似乎大多数負責干部特别是中下級干部都不称职，似乎事情都坏在有了人事制度，都坏在重視了干部的政治情况，因而弄得“重德不重才”，沒有“任人唯才”，沒有“不拘一格用人才”。这是資產階級右派的意見，对于这种意見必須加以坚决的拒絕和駁斥。

党和人民政府历来的選擇干部的标准就是德才兼顧，或者說既重視政治情况，又重視业务能力。干部是要做工作的，当然应当注重业务能力。但是人不是机器。机器可以掌握在誰的手里就为誰服务，人的一举一动都受着自己的思想所支配。在人类世界还存在着階級的时候，人的階級立場对于人的政治行为具有决定的作用。地主縱然文化很高，詩詞歌賦琴棋書画可以无所不曉，但是決不能領導土地改革，也決不能領導农业合作社。同样，資本家办事無論如何有效率，決不能領導“三反”和“五反”，決不能領導社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只有工人、劳动农民以及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中的经过考验的先进分子，才能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骨干。只有在思想上拥护或者至少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忠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因此，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工作，不是普通的行政事务问题，而是关系国家命运、影响国家政权性质的原则问题。在革命时期，这个问题尤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正是决定于什么阶级取得了和掌握了政权，什么政治力量组成了政权。一切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的人，反对用人应当重视政治情况的人，恰恰忘记了或者故意“忘记”了这一点。

历史上的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以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组成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开地指明这一点，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却往往竭力把自己伪装成为“全民”的国家。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绝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用新的人、新的组织、新的方法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他的领导下，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建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条也明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这里，没有也不能有丝毫含糊的地方。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当然有责任按照工人阶级的政



治标准来挑选干部，当然有责任使我们的国家机关的构成确实符合于宪法的规定，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曾经这样来描写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马克思所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要归结于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为实现推倒资产阶级，就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所必然进行的拼命反抗，并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设新经济制度的这样的统治阶级，才能够做到。”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不与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在经济文化工作中充分地使用一切在旧社会受教育的、但是愿意同劳动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是说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领导。在我国，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而且有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挑选干部的任务就显得格外繁重而复杂。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领导不受动摇，对于各种出身不同、经历不同的干部的政治历史、政治倾向和政治品质进行了解，根据干部的政治情况和业务能力作适当的安排，这种必要不是很清楚的吗？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照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不要人事制度，糊里糊涂地使用干部，以致把重要的职责委托给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别有用心的人，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人民民主的政权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这个道理不也是很清楚的吗？

反对重视干部政治情况的人，常把所谓“德”说成一种抽象的东西，或者把它说得神秘莫测，或者把它说成是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的化身。这当然是一种歪曲。实际上，如前所说，在我们的国家机关（更不必说经济文化组织）中间，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对旧人员

“包下来”的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容纳了大量的在过去历史上同革命绝少姻缘甚至是站在敌对方面的人物，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自己的工作人，当然不能不提出一定的政治上的要求。过去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但是审查清楚是必要的；过去的政治主张尽管存而不论，但是在现在接受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制度是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八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这里规定的就是我们的国家要求于全体工作人员的起码的“德”。国家在选拔和考核工作人员的时候，固然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标准，而且在培养和教育工作人时候，也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标准。反对重视干部政治情况的人，也反对在学校中进行政治教育，反对在高等学校招生和选派留学生的时候注意政治条件。这本来没有什么可怪。可怪的是高等教育部的一些同志们，在改进选派留学生办法的时候，似乎也认为“重政治、轻业务”的批评是正确的，似乎也认为选派留学生可以不问政治，“一视同仁”，（见5月29日本报第一版）。轻业务当然不对，但是重政治有什么不对呢？选派留学生，以至招收和培养高等学校的学生，分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同人民的事业都有重大的关系，怎么可以不重视政治呢？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权在选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方面都是有政治标准的，所不同的只是各有具体内容，有拥护劳动人民利益和反对劳动人民利益的区别罢了。真正不管干部的政治情况的国家，在世界上是没有的。那些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所谓任人唯才、要求用人不问政治情况的议论，如果不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于在政治上无知。

右派分子恶毒地攻击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部门，把它说成是“宗派的窝子”，说成是“闹工贼”。他们如此仇恨人事工作部门，可见人事工作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是怎样重要了。诚然，人事

工作部門的一部分工作人員還缺少足夠的知識和經驗，他們的工作的方法方式必須有許多重要的改進，他們在干部的選擇和提升方面也犯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錯誤，必須加以切實的糾正。但是，從總的方面說來，人事工作部門所執行的路線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他們在建國八年來的繁重的工作是有巨大成就的，這是不能推翻的事實。黨和人民政府提拔了大批的工人、農民、婦女、青年、“小知識分子”、“穿破鞋的”、種種在舊社會被侮辱和損害的優秀人物到我國的政治舞台上來，到各個戰線的重要崗位上來，讓他們成為我們國家的脊骨，這難道做錯了嗎？如果不是依靠他們的埋頭苦幹，依靠他們同廣大群眾的密切聯繫，難道我們的國家能夠這樣徹底地完成民主改革，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並且這樣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嗎？如果不是依靠他們同群眾一道不屈不撓地努力，難道我們的國家能夠這樣有效地戰勝各方面的嚴重困難，我們的建設事業能夠這樣地突飛猛進嗎？舊時代官僚機關里儘管充滿了“才俊之士”，却從來不能脫離假公濟私、任用私人、貪污詐騙、壓迫群眾等等丑惡現象，這種現象在我們的國家機關中不是基本上消滅了嗎？我們已經組成了新型的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國家機關，這個基本事實就證明了黨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是正確的，成功的。當然，應該指出，我國建設事業的一切成就，包含各方面的技術專家的勞動成果在內，包含從舊社會來而真正效忠於新社會的公務人員的勞動成果在內。但是他們都獲得了為祖國服務的機會，這個事實不正是證明了我們的人事工作部門並沒有排斥非勞動人民出身的工作人員，並沒有實行“任人唯黨”的宗派主義路線嗎？

在我們的人事工作中，宗派主義的傾向是有的，黨的整風運動的任務之一，正是要同這種有害的、非工人階級的、非社會主義的傾向作鬥爭。但是反對宗派主義，決不是說用人可以不問政治。恰恰相反，在反對宗派主義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同黨內外的那種認

为用人可以不問政治的傾向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貫徹德才兼顧的原則，才能在人事工作問題上达到整風运动的目的。取消效忠于人民群众、效忠于人民民主、效忠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势必出現另一种只有利于少数人的政治标准。那不但是彻底的宗派主义的政治标准，而且根据历史的客观規律，那必然是一种反动的、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

## 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驗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論

反右派斗争正在向全国各阶层、各地方发展。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沒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是不能巩固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能胜利，社会主义是沒有希望的。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涉及到全国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次革命斗争的組織者和领导者，每一个党员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上的考驗，每一个党员也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似乎認為右派分子只有党外才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的队伍中才有，而在共产党内部是不会有。可是这个看法不符合事实。各地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經揭发出許多党内的右派分子了。

难道我們共产党不是最彻底的左派嗎？是的，共产党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力量，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最可靠的支柱，共产党人当然都應該是左派。事实上，我們党的絕大多数党员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們在历次革命斗争

中領導群眾向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勢力英勇搏鬥，在這次反右派鬥爭中也同廣大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在一起，向資產階級右派作堅決的鬥爭。但是不能否認，也有一部分黨員的立場却並不是明確的堅定的，他們在這樣嚴重的鬥爭中認識模糊，態度軟弱；還有極少數的人雖然掛着“共產黨員”的招牌，實際上卻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當資產階級右派向党進攻的時候，他們成了可恥的內應。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呢？

黨不是獨立在社會之外的。黨雖然經常注意嚴格地挑選黨員和教育黨員，但是究竟不能完全防止一些不可靠的分子混入黨內，也不能完全防止一些黨員的墮落變質。當革命的形勢、任務、性質發生變化，各種社會力量重新改組的時候，這種變化，這種改組，必然也會反映到黨內來。

有少數人參加黨實際上並不是為了革命的利益，這些人在他們個人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就會背叛黨；有少數人只同意黨的一部分綱領，而並不同意黨的整個綱領，在黨實現那些他們所不同意的綱領的時候，他們就會背叛黨；還有少數人在革命鬥爭的長時期中，不能始終一貫地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聯繫，不能始終一貫地保持堅強的革命意志，他們受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經不起大風大浪，在鬥爭的緊要關頭就會背叛黨。這樣的情形，在黨的各個革命時期都曾經出現過。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曾經有許多黨員背叛黨或者離開黨，並且出現過象陳獨秀、張國燾這樣的人所共知的叛徒。在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鬥爭中，也曾有不少黨員喪失立場，站在地主方面反對農民，因而被開除出黨。社會主義革命是一次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深刻得多困難得多的革命。因此，一些抱着個人打算入黨的黨員，一些只能參加民主革命的黨員，一些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喪失革命意志的黨員，在這次革命鬥爭中離開黨的隊伍是毫不奇怪的。而且，這對

于我們党的队伍的巩固和纯洁，还有很大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說：“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繼續干下去了，退党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問題的困难倒是在于，党内的許多右派分子并不声明自己的右派立場，并不声明要求退出党的队伍。他們的资产階級右派面目，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容易被彻底发觉，就好象魚沉在水底一样。这一次，资产階級右派借口帮助党整风，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的进攻。这是資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一次惡战，是中国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一次惡战。在階級斗争的大风暴中，人們的立場比較鮮明了。党内的右派分子，这才把真面目表露出来了。他們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錯誤，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夾攻。

很明显，我們必須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右派分子严格划清界限，并且向他們进行坚决的斗争。可是現在还有少数人觉得对党内的右派分子似乎可以宽容些，不必要象对党外右派一样地給以反击，这种意見是錯誤的。对党外右派不能有溫情主义，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同样不能有溫情主义。誰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如果党的核心瓦解了，无产階級领导权丧失了，堡垒就可以不攻自破了。为了使党的肌体不被右派分子腐蝕，为了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必須对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視同仁”地展开斗争。

对党外右派分子的反击，不应当采取簡單急躁的方法，同样，对于党内右派分子，也不应当簡單急躁。孤立右派分子最有效的方法，是充分揭露事实，进行說理批判。在对党内右派的斗争中，真正的右派分子决不可溫情放过，但也决不可把不是右派分子的人划入右派。

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对于我们全党是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真金不怕火炼，这次斗争是冶炼真金的大熔炉。党内的右派分子只占极少数，在许多单位的党组织内，甚至一个右派分子也没有。但是在种种问题上表现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右倾情绪，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摆不定，在党内就远不是极少数人的事了。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许多党组织内还有相当市场。因此，每一个党员都应该通过这次斗争进行检查，纠正错误观点，提高革命觉悟，使我们的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定要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永远保持朝气，永远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凡是愿意献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主义者，一定要在反右派斗争中，坚决地服从党的领导，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这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根本的胜利。